

中國政治人物研究的新視野

一 著名政治家、中國前總理周恩來研究現狀評析

徐行*

<目次>

- 一、周恩來從政簡歷及重要影響
- 二、近三十年來周恩來研究概況
- 三、當前周恩來研究成果和爭論問題
 - (一) 早年和民主革命時期的周恩來研究
 - (二) 周恩來與中國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
 - (三) 周恩來與中共統戰策略的運籌
 - (四) 周恩來的外交風格與中外關係
 - (五) 周恩來與文化大革命問題
 - (六) 周恩來與其他重要政治人物的關係
 - (七) 關於周恩來的總體評價與綜合研究
- 四、研究局限和今後需要開拓的領域

一、周恩來從政簡歷及重要影響

衆所周知，中國共產黨是當今中國的執政黨，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和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起了決定性作用。在這個領導核心中毛澤東無疑是第一位的，但周恩來亦發揮了旁人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周恩來自1927年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起，直到1976年去世，整整半個世紀始終側身於中共最高領導層，並在早期一段時間內比毛澤東在黨內更有發言權和決定權。毛澤東雖為中共一大代表，但長期不在中央工作，直到1935年遵義會議後才進入中共中央領

導核心。鄧小平進入中共中央決策圈是在1954年任中央秘書長以後。而周恩來自1927年進入中共中央決策層後始終未倒，在中國政壇上縱橫馳騁了五十年，他幾乎一直處在時代旋渦的中心，並且給時代留下他個人的深深印記。

欲全面了解中國現代史和當代中國政治，不得不研究中國第一大政黨——中國共產黨，而欲全面了解中共黨史，則須深入研究周恩來與中共半個世紀的淵源，須仔細探討周恩來在中共中央的地位和中國政治經濟變革中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上說，周恩來的一生是中共半個世紀歷史的一個縮影。離開對周恩來的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以及現代中國政治、中國外交、中國經濟中許多重要問題很難闡述清楚。

周恩來50年間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和作用大致可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1927—1935年。這是周恩來在中共黨內崛起的階段。周恩來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是從掌管中共最初的武裝力量發端的。他1924年從歐洲回國，很快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兩廣區委軍委書記，1927年中共五大後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軍事部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這一時期周恩來雖初出茅廬，嶄露頭角，但風華正茂，勢頭很猛。他掌握了中共的最高軍事領導權和組織大權，在中共領導核心中處於很靠前的位置，其地位和影響在毛澤東之上，而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人此時還未進入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層，尚無法與之相比。

第二階段：1936—1945年。這十年是周恩來在中共高層架構內權力較弱的時期，其主要在中共的外交、統戰方面發揮了突出作用，並負責中共南方各省的組織工作。他這段時間擔任過中共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中共南方局書記。而這十年恰恰是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最高領導地位確定和劉少奇開始崛起的時期。周恩來這十年的統戰工作結交了許多黨外朋友，為中共建國後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第三階段：1946—1956年。這一時期是周恩來才華橫溢，成熟老練，充分發揮了聰明才智的時期。他在中共黨內的地位處於第三（劉少奇升為第二）；但在政府、軍隊中的實際地位和作用應排在第二位。這段時間他擔任了中共中央軍委

* 中國 南開大學 政府管理學院 政治學系 教授，南開大學 周恩來研究中心 主任。

副主席(1952年前是常務副主席)，并兼任了三年多的總參謀長，更重要的是他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兼外交部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副主席(1954年後代替毛澤東擔任了全國政協主席)。在建立全國政權過程中他比中共的其他任何成員做了更多更具體的工作。

第四階段：1957—1965年。這一階段是周恩來地位相對穩定，權力略有減弱的韜光養晦時期。他仍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但不再擔任軍委副主席，也不再兼任外交部長。他在中共高層架構中的地位和作用略有降低，他的一些主張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而無法施展，他的部分權力(特別是經濟決策權和軍權)由於劉少奇走到前台領導一線和林彪的漸漸崛起而有所減弱。

第五階段：1966—1976年。這一階段是中共高層架構分化重組最頻繁、最混亂的時期，也是周恩來一生中最困難、最操心、最違心的時期。這十年中周恩來的政治地位在劉少奇、林彪倒台前處於第三，在此二人倒台後處於第二，而從實際發揮的作用看他僅次於毛澤東，他晚年受到四人幫集團攻擊，苦苦支撐，盡力維持殘局，對拯救國民經濟和穩定全國政權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在全國民眾和各界人士中贏得了極高的聲譽。

周恩來一生中有五十年在中國政壇上和中共核心中縱橫馳騁，在中外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他剛去世不久就有人評論說：“周恩來是中共建立政權以來最突出的一人。他擔任了二十六年中共政權的總理。這不僅在民主國家中無此先例，就是在共產國家，也無此先例。”¹⁾縱觀周恩來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涯中有三個時期最具有實權，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五十年代初、七十年代初，這是中共基業創立和鞏固的三個重要時期。三十年代初他任中共組織部長和軍事部長，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共軍事力量的發展壯大發揮了重要作用。五十年代初中共剛剛建國，百廢待興，他嘔心瀝血、籌劃組建了新政府，具體指導了國防、外交、經濟各項事業的開創。七十年代初中國大陸“文革”風暴的巔峰已過，他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努力穩定局勢、力圖將各行各業在毛允許的範圍內納入“文革”前的軌道。

周恩來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卓越表演時期，正是中國社會風雲變幻、動蕩不

安的歲月。他以高超的政治手段、溫文爾雅的風度、勤勉的工作態度和良好的道德風範，博得了相當多中外各階層人士的信服和贊揚，甚至一些國家與他接觸過的西方國家領導人對他亦有好感。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其所著的《領導者》一書中評價說：周恩來是“有獻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謀遠慮的現實主義者，是政治斗爭的能手和杰出的調解人。”的確，周恩來任勞任怨、清正廉潔的作風深深贏得了中國億萬底層民衆的同情和支持。(當然也有人認為他過於圓滑多變，工於心計，善於偽裝)，因此，在他去世後三十餘年間在國內的聲譽不但沒有減低，反而愈來愈高，超過了中共歷代領導核心的任何人，更在當今領導人之上。至今，周恩來在國際上亦保持着較好的形象，公認他是中共有史以來品德最優、廉政政績最佳、較為謙和、相對民主的領導人，尤其是其廉潔自律的風範和勤勤懇懇的敬業精神為各界人士所稱贊。周恩來一生的所作所為與當前中國國內一些官員的腐敗、平庸現象形成了鮮明對照，遂使底層平民更加懷念他，也影響到學術界對他的評價。

二、近三十年來周恩來研究概況

中國大陸對周恩來研究開始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今已經形成了三次高潮，或者說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為第一個階段。1976年，隨着中國最重要政治人物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的去世和“四人幫”的倒台，中國廣大民衆對周恩來的追思和悼念成為促使學術界對當代政治人物進行重新評價和研究的很大動力。

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講，1976年周恩來去世後中國大陸民衆和學者還談不上對周恩來進行理性的科學的研究，僅僅停留在懷念、追悼、宣傳、頌揚等層面上。但這段時間出版了一大批回憶文章和紀念性書籍為後來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本素材。

深入研究周恩來生平和思想，必須以大量的準確可靠的文獻和資料作為它的

1) 李天民著，《周恩來評傳》(阿爾泰出版社，1976年3月出版)，第187頁。

基础和前提。自八十年代以來關於周恩來的官方資料開始公布，研究性論著也開始問世。首先是中國官方和學術界整理出版了一批周恩來的著作，包括他的講演、電報、文稿等等。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決定公開出版了《周恩來選集》上下卷。²⁾以後，又陸續出版了《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周恩來教育文選》、《周恩來書信選集》、《周恩來年譜(1898-1949)》等。³⁾其次是國內外學術界涌現出一批專門論述周恩來政治、外交活動的論著。如英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迪克·威爾遜的《周恩來傳》、日本學者鳥居民的《周恩來與毛澤東——周恩來試論》、美籍華人學者張大衛的《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來與鄧小平》，以及前蘇聯學者沃洛霍娃的專題研究論文《周恩來與中國外交》等等。⁴⁾尼克松所著的《領導者》一書和基辛格所著的《白宮歲月》一書中，⁵⁾也有專門章節議論到周恩來。這些著作評述了周恩來一生的主要外交活動，初步研究了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風格及其對鄧小平外交政策的影響。

1988年是周恩來誕辰90周年，中國大陸周恩來研究形成了第一次高潮。中共中央召開了紀念大會，中央文獻研究室舉辦了全國規模的周恩來研究學術討論會。中國外交部舉辦了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的學術討論會，南開大學召開了第一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代表九十餘人，其中包括美、俄、日、英、法、朝等國學者。會議就“周恩來與中國革命”、“周恩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周恩來的思想品德作風”三個主題進行了研討，中共中央和天津市新聞媒體都對會議進行了報道，會後出版了論文集。⁶⁾

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周恩來研究進入第二階段，這一階段有更多的周恩來的

2) 《周恩來選集》上下卷，由人民出版社1980年和1984年先後出版發行。

3)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周恩來教育文選》(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出版)、《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出版)。

4) [英]迪克·威爾遜著，《周恩來傳》(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出版)、[美]張大衛著，《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來與鄧小平》(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年出版)、[日]鳥居民，《周恩來與毛澤東——周恩來試論》(東京草社，1975年出版)。

5) 尼克松著，《領袖們》(知識出版社，1983年出版)、基辛格著，《白宮歲月》(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出版)。

6) 第一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外學者論周恩來》，1989年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

講話、文章等被編輯出版，如《周恩來外交文選》、《周恩來經濟文選》、《周恩來1946年談判文選》、《周恩來軍事文選》、《周恩來文化文選》、《周恩來早期文集》、《周恩來政論集》⁷⁾等等。此外，中國大陸的中央檔案館、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黨校等陸續公布了一批黨史資料，如原周恩來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童小鵬主持出版的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南京局的歷史資料叢書中包括了不少周恩來的講話和文稿。當周恩來誕辰95周年的時候，中央文獻研究室分別同浙江、江蘇兩省合作舉辦了兩次學術討論會。與此同時，許多同周恩來有過直接交往和接觸的人發表了大量回憶文章。這些文獻資料的發表，為研究工作的蓬勃開展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1998年前後中外周恩來研究達到第二個高潮，中共中央召開了紀念周恩來誕辰一百周年大會，官方出版了四卷本的《周恩來傳》⁸⁾和1949年後的《周恩來年譜》三卷。⁹⁾學術界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如《開國總理周恩來》、《周恩來的卓越奉獻》、¹⁰⁾《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周恩來文藝思想研究》等，還翻譯出版了一些外國學者的著作，如英籍作家韓素音的《周恩來與他的世紀1898——1998》、加拿大學者羅納德·C·基思的《周恩來的外交生涯》等。¹¹⁾原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亦出版了一批回憶錄，如《不盡的思念》、《人民的總理》、《風雨四十年》等。關於周恩來的一些總結綜述性研究也開始問世，最具代表性的是《周恩來研究述評》和《人民總理周恩來》¹²⁾兩部書。幾乎與此同時，中共中央

7) 《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出版)、《周恩來經濟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出版)、《周恩來1946年談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出版)、《周恩來軍事文選》(全四冊)(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周恩來早期文集》(上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和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周恩來政論選》(上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

8)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

9) 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中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出版)。

10) 力平著，《開國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出版)、石仲泉著，《周恩來的卓越奉獻》(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

11) 韓素音著，《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出版)、加拿大學者羅納德·C·基思著，《周恩來的外交》(東方出版社，1992年出版)。

12) 李海文主編，《周恩來研究述評》(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出版)、郭思敏主編，《人民總理周恩來》(全三卷)(紅旗出版社，1997年出版)。

和一些省還出版了一批影視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影視作品是十二集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周恩來》。

為紀念周恩來誕辰一百周年，1998年中共中央和中國各地分別召開了各種類型的紀念會、研討會。在中央舉行的紀念大會上，當時的總書記江澤民親自出席，並發表講話對周恩來做了高度評價。南開大學與天津市政府聯合主辦了第二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代表150餘人，包括美、俄、日、英、韓、加拿大、新加坡、印度等國學者。這次會議就“周恩來的青少年時期”、“周恩來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周恩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周恩來與文化科技教育事業”、“周恩來的思想品德”、“周恩來與中國外交”六個主題進行了研討，會後出版的論文集。¹³⁾這本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和幾乎與此同時出版的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¹⁴⁾基本上代表了上個世紀周恩來研究的最高水平。

這一階段周恩來的研究在廣度上也取得了進展，披露了一批新史料。1999年中國在這方面已經出版的書籍有400種以上，各大報刊和學術雜誌發表文章有5000多篇。從內容來看，既有綜合性的考察，又有很多專題研究。至於研究論文所涉及的方面更加廣泛，可以說對周恩來一生各個時期的歷史，幾乎都有人作過或深或淺、或多或少的研究。這一階段出版的關於周恩來的書文已經不象第一階段初期那樣停留在緬懷、回憶、頌揚的層次上，較多的成果靠近了學術探討和研究的性質。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周恩來研究也進入了第三階段。這一階段中外學者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多了一些客觀分析和思考。中國國內和國外皆出版了一批有水平有分量的研究論著和史料，如《周恩來與新中國外交》、《周恩來的總理生涯》、《周恩來的晚年歲月》、《周恩來與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奠基》、《南開學者縱論周恩來》等等，¹⁵⁾以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等。¹⁶⁾這

13) 第二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外學者再論周恩來》，1999年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14)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全國周恩來生平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

15) 裴默農著，《周恩來與新中國外交》(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出版)、熊華源、廖心文著，《周恩來的總理生涯》(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年出版)、劉武生著，《周恩來的晚年歲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徐行者著，《周恩來與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奠基》(天津人民出版社，

個時期對周恩來已不是一味贊頌，許多學者根據不同的立場和掌握的不同史料對周恩來做了不同的分析和評價，學術界已經開始出現爭議，其中以高文謙著的《晚年周恩來》引起的爭論最大。在當代中國政治人物中除了毛澤東和鄧小平以外，各界對周恩來的關注和研究是最多的，爭議也是最多的。

2008年4月，南開大學與中央文獻研究室和天津市聯合舉辦了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將周恩來研究再次推向高潮。本次大會共收到國內外論文100余篇，來自美國、日本、韓國、俄國、澳大利亞和中國6個國家的上百名專家和學者雲集南開園，參加了這次國際學術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原外交部長、現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李肇星出席了大會。會議邀請了中國大陸著名學者石仲泉、章百家、沈志華和韓國仁荷大學的李在光教授、澳大利亞亞格里菲斯大學的羅伯德·基思教授、日本創價大學的高橋強教授、台灣成功大學的鄭梓教授、美國奧本大學的翟強教授在大會上作了學術報告。學者們圍繞周恩來早年和與民主革命，周恩來與新中國各項建設，周恩來精神和思想，周恩來與中外關係四個專題分組進行了討論，在一些領域的研究有了新的進展。會後編輯了論文集，¹⁷⁾可以說這本書基本上匯集和代表了當前國內外學術界的最新研究進展。

如今，中國大陸周恩來研究的總體趨勢和隊伍狀況呈現出三個特點：

(1) 多年來關於周恩來研究的一些基本內容仍在繼續，但研究重心已經後移。如周恩來求學階段的思想和活動、周恩來與中共奪取政權的方式與道路、周恩來與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建設等等，仍在深入進行。一些學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得出了新結論，糾正了過去某些傳統觀點。但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特別是參加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多半是研究1949年以後的內容的，而且有不少聯系到當前的社會問題和國際問題，與一二十年前學者們重點研究周恩來青少年時代和中國民主革命時期有很大不同，這說明現在的研究更貼近現實。

(2) 仍有禁忌的內容不許學者研究，但周恩來與中外關係成爲一個可以研究的

2008年出版)、徐行主編，《南開學者縱論周恩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16) 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1-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出版)。

17) 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二十一世紀周恩來研究的新視野》，2008年底將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新熱點。由於中共關於周恩來等高級領導人的檔案不向民衆開放，所以許多問題學者無法研究。但是自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有限度地開放檔案以來，加之中國對外開放的大環境，研究周恩來與中外關係的學者越來越多，尤其是中日關係。中美關係成爲新熱點，反映了學術界對中國與這兩國關係的重視。這與世界上對周恩來研究的隊伍現狀也是吻合的，目前，國外周恩來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日本和美國。

(3) 周恩來研究隊伍有了新發展，國內研究力量的分布形成了新格局。二十多年前中國大陸真正從事周恩來研究工作的僅限於大學教師和專職研究人員。由於九十年代開始南開大學不斷招收和培養周恩來研究專業的研究生，所以現在一部分有研究生學歷的年輕學者參加到研究者的隊伍中來。目前中國國內的周恩來研究力量形成三大團隊：一是以南開大學教授及其所帶的研究生爲核心的天津團隊；一是以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專職研究人員爲代表的北京團隊；一是以南京、淮安等地方院校、紀念館和黨政工作者學組成的江蘇團隊。其中，以南開大學的研究力量最有基礎，最具潛力，相對來說研究水準也是較高的。該校是中國唯一一個能招收周恩來研究方向碩士生和博士生的高校，代表着中國政治人物研究事業後繼有人的希望。當然，中國其他單位、其他省市(包括港台地區)還有個別學者一直堅持做研究。

目前，中國大陸周恩來研究從機構上來說，只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南開大學成立了專門周恩來研究的機構(實際上前者是官方機構，後者才是中國唯一的學術機構)。但全國從事周恩來研究的人員的構成比較複雜。這支研究隊伍同其他研究隊伍相比的獨特之處在於：他不僅局限於專業工作者，還有許多不屬於學術界、理論界的人員，那些民間的(包括非官方的非專業研究人員也收集、整理了不少關於周恩來的文獻資料，寫了不少回憶、宣教、敘事、議論性文章，從某種意義上說也爲專業研究者開展學術研究奠定了基礎。

三、當前周恩來研究成果和爭論問題

經過中外衆多學者幾十年的努力，當前關於周恩來的研究幾乎涉及到其生平和思想的各個時期、各個方面，大多數問題已經比較清楚了，尤其是早年的經歷和家庭情況，但中共建國後，特別是周恩來晚年的一些情況由於檔案不開放和研究者的不同立場，仍存在許多爭議問題。從近幾年公開發表的學術論著和2008年春在南開大學召開的“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來看，關於周恩來研究比較有新意的成果和有爭議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 早年和民主革命時期的周恩來研究

這是一個以往研究成果較多的課題，最近中國學術界在這方面發表的有新意的觀點已不多見。2008年南開大學召開的國際會議上這方面引起爭議的問題主要有三：

一是周恩來的《大江歌罷掉頭東》這首勵志詩的創作時間是在周恩來赴日本之前寫的？還是他到達日本後寫的？有學者根據《周恩來旅日日記》分析，指出此詩乃1918年1月作於東京，否定了多年來學界認爲的創作時間是1917年9月“東渡前”的推測。¹⁸⁾

二是周恩來思想轉變和身份的確立是在五四運動時期還是在旅歐勤工儉學時期？以往多認爲是在五四時期。最近有學者通過對周恩來旅歐期間從事的政治活動的考察，闡明周恩來成爲世界著名政治家，外交家與這個時期接觸西方社會，思想完全成熟，經受政治運動鍛煉，積累了鬥爭經驗和組織才能分不開的。¹⁹⁾

18) 見南開大學崔國良教授提交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周恩來“大江歌”新考》。

19) 見南開大學徐行教授提交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周恩來旅歐時期的政治

三是周恩來和毛澤東是第一個提出通過武裝鬥爭開創中國革命道路的？誰在開辟農村包圍城市道路過程中誰起主導性作用？一些學者堅持傳統觀點，認為毛澤東是中國革命道路的主要開創者，為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做出了最主要的貢獻；另有一些學者認為是周恩來最早提出了“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的思想，作用和影響也比毛澤東大些，應該是周主毛輔。²⁰⁾還有學者重新評價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指出周恩來、瞿秋白主持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不僅成功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而且確立了中共的新的鬥爭方向——實行從“城市中心”向“鄉村中心”的偉大轉變。²¹⁾

(二) 周恩來與中國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

周恩來在長達二十六年的總理生涯中，對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特別是對新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開創性奠基，發揮了他人難以替代的特殊作用。現在關於中國前四個五年計劃主要是周恩來領導設計和實施的已無可爭議，1956年中國經濟的冒進和1957年的反冒進問題反映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不同的建設思路，兩人爭論的結果是周恩來妥協，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最後導致中國經濟蒙受巨大損失。這個問題已在數年前就有學者研究，最近又有學者依據大量的檔案文獻和回憶史料，重新梳理了中共高層在確定經濟建設方針問題上發生衝突的來龍去脈及其中的邏輯關係，論證了周恩來在反冒進問題上所發揮的作用。²²⁾

筆者近年來研究了周恩來與中國工業化建設問題，其成果於今年4月問世。²³⁾該書是系統而深入研究周恩來對中國經濟建設發揮的作用的專著，全面考

活動及對其一生的影響》。

20) 見南開大學劉焱教授，《周恩來與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開創》，載《黨的文獻》2007年第5期。

21) 見中共中央黨校黃少群教授提交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重評黨的六屆三中全會》。

22) 見華東師範大學沈志華教授提交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周恩來與1956年的反冒進——記中共高層關於經濟建設方針的一場爭論》。

23) 徐行著，《周恩來與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奠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察、客觀評析了周恩來的現代化思想及其採取的各項政策措施，將周恩來的事業與中國冶金、機械、能源、交通、化工、紡織以及農業等各行各業現代化建設具體情況聯系起來深入研究，探討了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並結合歷史進程、現存問題和未來世界潮流，對中國今後在向現代化邁進的征途中應抓住的關鍵問題做出自己的思考，分析了周恩來、毛澤東、鄧小平的現代化思想的共同點和分歧，着重闡明了周恩來現代化思想與鄧小平改革開放理論的傳承創新關係。並對周恩來領導下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成就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反思，對中國未來的現代化遠景進行了展望。

對周恩來與六十年代的中國三線建設問題，2008年南開大學召開的國際會議上有學者從參與三線建設決策、組織實施和對三線建設成果的捍衛等三個方面，探討了周恩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對於經濟建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²⁴⁾對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的中國經濟建設，也有學者作了較為客觀的評析。

建國之初作為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周恩來直接參與和領導了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為建設和鞏固新中國國防做出了卓越貢獻。以前這方面的研究雖有一些，但多是宏觀上論述，近年來有學者專門就周恩來與中國的空軍、海軍、裝甲兵等新軍兵種的籌建、周恩來與解放軍武器裝備現代化建設、周恩來與導彈、原子彈等國防尖端武器的研製等問題(包括中共中央特別委員會的問題)進行了新的探討。

(三) 周恩來與中共統戰策略的運籌

周恩來是中共統一戰線事業的主要開創者和領導人之一，多年來關於周恩來與統戰問題(包括兩次國共合作、政治協商會議、民主黨派問題、台灣問題等)研究也相對較集中，已有不少成果問世，海峽兩岸的學者和相關人士也披露了不少史

24) 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宋毅軍研究員提交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周恩來與三線建設的歷史回顧與思考》。

料。如：1956年3月16日 周恩來會見李濟深前衛士長馬坤(英籍)，請他向蔣介石轉達國共再次和談的誠意；1956年7月周恩來先後三次由邵力子、張治中、屈武、陳毅陪同，會見香港記者曹聚仁，交談了如何和平解放台灣的問題；同年10月周恩來陪同毛澤東接見曹聚仁，表明中共“如果台灣回歸，一切可以照舊”的想法。六十年代初期周恩來經與毛澤東協商，提出解決台灣問題的“一綱四目”方針，²⁵⁾並通過各種渠道向台灣當局轉達了這一信息等等。

近年來披露的新史料是已故的中國南海艦隊司令員吳瑞林生前回憶，他講述了不1963年底他接受任務為周恩來的一次護航行動。周恩來與原國民黨政要張治中到廣東省邊境，與兩位能溝通國共兩黨關係的人士進行了秘密會晤。這次會晤溝通，使當時的台灣當局與大陸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達成了默契，使國共兩黨有了一定基礎的共識。²⁶⁾

台灣學者最近撰文指出：“從中共第一代領導人針對國府高層的‘一綱四目’，到第二代領導人規範台海兩岸關係的‘一國兩制’，此間大綱大領不僅一脉相承，同時歷經風云猝變的國際現勢，處於內外交迫下的不斷調整和修訂，可說是在實踐中與時俱進，尤其在法理層面上益趨完備。”²⁷⁾，台灣學者從另一個角度研究了周恩來統一戰線策略的運籌後認為：周恩來在戰後兩岸關係運作的歷史進程中，起到了承先啓後的樞紐角色，他除了協助毛澤東一同決策外，親自而具體地做了大量的艱苦、細致、周密的籌劃及善後工作，可謂集決策、指揮和實踐三種角色於一身。在對台關係的處理上可以說是“居功厥偉”。

在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還有日本學者對比了周恩來親自執筆的《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草案初稿)》和中國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通

25) “一綱”為：只要台灣歸還祖國，其它一切問題悉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妥善處理。“四目”是：(1)台灣歸回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蔣介石和陳誠全權處理。(2)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3)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須條件成熟，並尊重台灣當局意見協商決定，然後進行。(4)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一綱四目”的具體內容參見劉武生著，《周恩來與共和國重大歷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1頁。

26) 見華夏經緯網02/18/2003 09:09:32:《周恩來40年前的絕密之行》。

27) 見台灣成功大學鄭梓教授提交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戰後台海危機中周恩來的角色及其運籌一以“一綱四目”為樞紐的再探討》。

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異同，考察了周恩來籌建新中國的思想軌迹。²⁸⁾作者比較和分析的結果，發現周恩來起草的草案初稿，強調聯合廣泛的階級和階層參加統一戰線，比《共同綱領》更具有民主性。

(四) 周恩來的外交風格與中外關係

作為新中國外交工作的創立者、指揮者和實踐者，周恩來參與制定了新中國的外交方針和政策，為打開中國外交局面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在其豐富多彩的外交生涯中，形成了內涵豐富的外交思想，創造了獨具特色的外交風格。關於周恩來與中國外交問題，多年來一直有學者和外交界的官員(包括退休的官員)進行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問世。在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又有中外學者提交了相關論文二十多篇，其中有分量有深度的論文有：韓國仁荷大學李在光教授的論文《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完美結合——周恩來外交思想根源與模式之評析》、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的羅伯德·基思教授的論文《對周恩來和平共處外交的當代評價》、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研究員提交的論文《忠於時代，超越時代——周恩來與中國外交》、華東師範大學沈志華教授的論文《“中國旋風”——周恩來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響》、美國奧本大學翟強教授的論文《周恩來和中越關係》、華東師範大學李丹慧教授的論文《打開中美關係進程中的周恩來——來自尼克松外交檔案的新証据》、日本中央大學大澤武司博士的論文《周恩來的日本戰犯處理政策》等等。

韓國“中國學研究會”會長、仁荷大學李在光教授的論文頗具功力和特色，他從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堅定靈活和以誠待人等四個方面概括了周恩來的外交風格。他認為：“作為新中國建國以來最優秀的總理，更作為一位在外交舞台上極為出色的外交家，周恩來在主持中國外交工作長達二十六年的歲月里，為中國的外

28) 見日本中央大學的杜崎群杰博士提交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從共同綱領草案看周恩來的建國思想》。

交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對世界各國之間能夠和平相處、穩定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础。這一點是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中韓正式建交也已經跨入了中韓關係飛速發展的第十六個年頭，對周恩來的外交思想進行研究就更具有了深刻的意義。同時也對中韓外交關係的進一步深化和強化具有很强的現實啓發性。”²⁹⁾

在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中國權威學者從四個方面對周恩來特殊的外交貢獻做了總結：(1)奠定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的基础；(2)組建了一支正規化的外交隊伍，培養了中國外交人員的優良傳統(3)提出了求同存異的外交思想，塑造了中國外交堅韌灵活的風格(4)構建了中國對外關係的基本框架，是全方位對外關係的最早開拓者、多邊外交的最早實踐者。³⁰⁾還有一些中國學者根據新近公開的資料，對周恩來在中國與日本、美國、越南、印度等不同國家的關係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做了新的考察和論証。

(五) 周恩來與文化大革命問題

周恩來與文化大革命。這是周恩來研究中一個不容回避的課題，也是學術界特別關注的問題。因為這一階段是中國社會政治鬥爭最激烈、最頻繁、最混亂的時期，也是周恩來一生中最高峰、最操心、最違心的時期。這十年他倍受夾擊，苦苦支撐，盡力維持殘局，為維護國計民生的正常運轉任勞任怨、殫精竭慮，在中國民眾中贏得了極高的聲譽。當然，在特殊的環境下他對重大政治問題和政治人物的態度也不得不按毛澤東的意志去辦。這點，鄧小平在1980年接見意大利記者時已經做過評論。鄧小平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

29) 見大韓民國仁荷大學李在光教授提交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完美結合——周恩來外交思想根源與模式之評析》。

30) 見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研究員提交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忠於時代，超越時代——周恩來與中國外交》。

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³¹⁾中國大陸學者基本認可鄧小平的評價，對周恩來在文革中盡量減少動亂給國家造成的各方面損失、力保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開創中美、中日關係的新局面、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保護了一批老干部和民主黨派人士給予了積極肯定，對他在打倒劉少奇等政治事件中的無奈之舉和文革中的艱難處境表示諒解和同情。

中國大陸學者雖然對周恩來與文化大革命問題格外關注，但由於受檔案資料和社會環境限制，有分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問世不多。最近有大陸學者對1973年“批周”風波進行了重新考証和分析，指出之所以發生這場風波，是在“文革”的不正常狀態下，毛澤東對復雜的中美蘇三角關係的外交決策完全依賴個人決斷，信息反饋僅僅信用個別身邊人的匯報。當然，毛澤東對“批周”的態度和江青集團上綱上線打倒周恩來是不同的。³²⁾

海外學者對文化大革命問題有較大興趣，對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表現更多的是負面評價。引起很大爭議的《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認為，周恩來在“文革”中扮演了“雙重角色”，他既是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的執行者，同時又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補救者。說周恩來是“文革”的執行者，是因為他在“文革”十年中一直處在最高權力核心圈中，是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說周是補救者，則因為他做了一些減緩補救的工作，但並沒有也不可能扭轉整個局勢。作者進一步分析周恩來能夠在“文革”中扮演雙重角色，是因為他善於在政治上走鋼絲，懂得見機而作，執兩用中。如果他不能在當時各種矛盾對立的衝突中保持自身的平衡，早就從政治舞台上跌下來了，或者被雙重角色的內在矛盾撕成兩半了。作者認為這就是周恩來的為政之道。³³⁾

31) 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

32) 見當代中國研究所的陳東林研究員提交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周恩來最艱難的時刻——1973年“批周”風波考述》。

33) 高文謙，《把歷史的知情權還給民眾》，原載《當代中國研究》2004年第4期(總第87期)。

(六) 周恩來與其他重要政治人物的關係

周恩來的人際關係很複雜,研究周恩來與國共政要、與民主黨派、與各界人士交往的論著也比較多。特別是對周恩來與毛澤東、鄧小平、孫中山等偉人關係的研究成爲熱點。

關於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關係,中國大陸學者多認爲,兩人基本上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戰友,多數時間多數問題上兩人思想一致,合作還是不錯的,只是在“文革”、“大躍進”、“反冒進”等一些具體問題上兩人思想有分歧。這種觀點以中國大陸黨史權威金沖及爲代表,他認爲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兩個人,的確是不可分離的。說起來很有意思,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常常有兩人并稱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國的洪楊(洪秀全、李秀清)、戊戌維新運動的康梁(康有爲、梁啟超)、辛亥革命時期的孫黃(孫中山、黃興)、中國共產黨建黨前後的“南陳北李”等。兩個人中總是以一個爲主,另一個也有別人難以替代的作用,往往是相互補充和相互依存。在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雖然沒有“毛周”這樣的說法。但兩人關係的緊密是有目共睹的。在重大決策過程中,毛澤東的主導地位是毫無疑問的,但這之後缺不了周恩來具體落實。毛、周二人間有着高度的默契。³⁴⁾

但中國海外一些學者不同意這種觀點,其中有影響力的看法之一是:毛、周之間是一種“現代君臣關係”。因爲毛、周兩人的關係既非現代意義上的政黨領導集團內部各成員之間平等合作的關係,也不完全等同於歷代王朝皇帝與臣子之間的關係,而是兩者的雜交。從現代政党的角度來看,毛、周兩人雖說同屬執政黨領導核心中的成員,但地位并不平等,高下懸殊,毛一人獨斷專行,周只能俯首听命。可是與封建王朝中皇帝和臣子的關係相比,毛、周關係又不有所不同。最大的區別乃在於封建王朝是政教分離的,皇帝雖握有君權,在世俗社會中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却無法主宰臣民們的精神世界,皇帝之上還有“天道”和“神權”約束着他;而毛澤東則集神權和君權於一身,他既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又是真理的化身、事業的旗幟,一旦違上,勢必叛道。這就是周晚年所處的政治困境。³⁵⁾

34) 《金沖及談毛澤東與周恩來》, 海外名人書庫, <http://book.backchina.com>.

關於周恩來與鄧小平關係的研究,近有台灣學者得出新的研究結論:在周恩來與鄧小平兩人相識、相處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維度中,文革前十年具有承先啓後的意義。“周、鄧自早期以降所積累的對彼此的認識與信任,到了1950年代中期已臻成熟,并可適切地轉化、表現在之後雙方的工作與往來上。周、鄧在這一時期內的密切配合與協作,以及以此爲前提所生成的對對方更進一步的了解與熟悉,更是兩人在1970年代前半期默契攜手治政的關鍵基礎。”該學者認爲,周恩來和鄧小平在“文革”前良好的互動方式與默契情誼,對“文革”期間的兩人關係乃至中共政治發展與演變,都產生了不可小覷的影響。³⁶⁾

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是首次國共合作的主要締造者之一,爲推動國民革命運動的開展,他審時度勢,以博大的胸襟實行了聯俄容共的政策,開創了廣東革命基業。中國大陸學者研究認爲,周恩來是中共領導人中爲數不多的與孫中山及其事業有較多聯系的人,他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倡導者和積極實踐者之一。他積極參與了國民黨駐歐支部的籌建工作,開啓了國共合作的先河。孫中山是黃埔的奠基者和最高領導人,周恩來則是共產黨中積極致力於黃埔軍校籌辦和建設的早期領導人。他1924年回國後任該校政治部主任,其出色的工作使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大大加強。雖然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後不久孫中山與世長辭了,但周恩來始終沒有忘記孫中山的豐功偉績,多次在不同場合給予孫中山及其開創的事業很高的評價,而且在其後半生還對孫中山夫人給予了特別關照和保護。兩位世紀偉人共同開創的偉大事業和崇高的思想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精神財富。³⁷⁾

關於周恩來與其他中共政要的關係現在也存在着一些爭論,如在劉少奇問題上周恩來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在林彪和四人幫兩大集團中如何周旋、對陶鑄、彭德懷、賀龍等人的被打倒到底什麼態度等等現在都有不同的看法。在周恩來對待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的問題,現在學術界爭議較小,多數人認爲周恩來待人溫和,相對民主,與各界人士皆能建立良好的關係,他是爲中共統戰事業和中

35) 高文謙,《把歷史的知情權還給民衆》,原載《當代中國研究》2004年第4期(總第87期)。

36) 見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鍾延麟博士提交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文革”前周恩來與鄧小平關係之研究》。

37) 見南開大學徐行教授提交孫中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孫中山與周恩來》。

國的政治協商制度做出最大貢獻的人。近有學者以周恩來與陳嘉庚的交往為例，說明此乃中共對海外僑胞統一戰線工作的縮影。他們之間的交往反映出周恩來人格的魅力，亦反映出新中國建立初期民主政治的良好開端。³⁸⁾

(七) 關於周恩來的總體評價與綜合研究

周恩來是舉世公認的杰出政治家，外交家，但人無完人，他有自身的缺點，這本不足為奇，但是近年來有些人故意夸大周恩來的缺點、弱點，甚至進行別有用心之攻擊和欺騙民衆。最近，中國大陸著名學者撰寫長篇論文，以大量的史實對此作了回應，文章從“愚忠說”辨、“幫凶說”辨、“偽君子說”辨和“自保說”辨等四個方面，針對當前中外各界人士對周恩來的非議和詆毀進行了辨析和駁斥。早在10年前該作者就用中華民族歷史上評價人物的“三不朽”的標準(即立功、立言、立德)來評價周恩來，認為周恩來是二十世紀中華民族的又

一歷史偉人，這次作者進一步提出：周恩來既屬於中華民族，也屬於全世界。周恩來其人、其史，是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豐厚精神資源，研究周恩來是一個永久性課題。該學者甚至提出要建立“周恩來學”。³⁹⁾

海外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大陸的評價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不能認同。每個人當然都應該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主張。如果真能夠客觀、公正地評價中國歷史和中國政治人物，本着既不諱過、也不苛責的原則，依據當時的中國社會環境比較客觀地分析評價周恩來等政治人物的功過是非，當然有利於學術發展。可惜的是海外相當一批以學者面目發表的對周恩來負面評價的文章，同樣帶有意識形態色彩，而且更強烈。有些已經超出了學術研究的範圍，成為惡意的人身攻擊，這已不屬於本文介紹和研究的內容。

筆者認為：綜觀周恩來一生，其在中共高層構架中的地位和影響僅次於毛澤東，而聲望、人品、在民衆心目中的地位又高於毛澤東。周恩來一生中從未任過中共中央一號人物，也從未積極謀取過該職位。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權威確定後，他基本上是在執行、落實毛的思想意志。在黨內鬥爭中他多採取退讓、回避、協調的態度，在中共高層構架中的作用多為二號或三號人物。然而，半個世紀來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的重要成員之一，所起的作用又與其他核心人物有很大不同。他與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博古、劉少奇、林彪在不同時期共同置身於中共核心領導中，其中不少人一段時間內地位在他之上。這些人對中共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某一事業的建設做出過成績，但最終在黨內鬥爭中紛紛落馬，唯獨周在政壇上縱橫了半個世紀之久。其雖不是第一領導，但長期負責中共最重要的工作部門(如軍事工作、組織工作)，對中共所起的作用自然比這些人大得多。特別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其工作帶有開創性，其對國家政權建設、國防建設、經濟建設及外交、科技、文化、教育各項事業的奠基有獨特的貢獻，某些方面甚至是黨內一號人物難與之相比的。

但同時亦應看到，周恩來有軟弱、搖擺的一面。自1957年後在重大問題上唯毛澤東的馬首是瞻，只在一些具體事物處理上相機行事。“文革”中雖然做了許多穩定國內局勢、保護幹部和民主人士的好事，但也表現出隨波逐流，左右逢源，明哲保身的弱點。其特長是統籌兼顧、穩步發展，動亂中求安定，內爭中求彌合。其特殊作用在於協同創業、精心守業、協調各方、穩定內部、執行天命、具體規劃。更進一步分析周恩來對中共和中國的深遠影響應在其身後。四人幫的倒台與周恩來晚年對葉劍英等老干部力量的扶植有一定的關係。七十年代後鄧小平的重新崛起，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三十年來改革開放政策對中國經濟騰飛、國力增強的影響已被舉世公認。但細究鄧小平的思想根源，乃是對周恩來一些經濟、政治主張的傳承發展。如增多私有經濟的比重、允許并鼓勵個體經營、積極引進外資、加強國際合作，堅持多黨合作和黨內民主等等，周恩來早在五十年代就已提出過，但在毛澤東的巨大陰影下無法實施；而鄧小平在八十年代毅然決然地把周的這些真知灼見繼承、創新，大胆摸索、努力付諸實踐，并取得了部分成功。鄧

38) 見中央黨史研究室任貴祥研究員提交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風雨同舟求解放 肝胆相照謀國是一 周恩來與陳嘉庚交往述評》。

39) 見中央黨史研究室任石仲泉研究員提交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為周恩來辯護——紀念中華之子周恩來誕辰110周年》。

小平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超過了周恩來，但這個影響中有周的思想印迹和周對鄧多年的政治支持。

四、研究局限和今後需要開拓的領域

中國大陸周恩來研究已成為近年來中國政治人物研究的新熱點，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在於：一是學者們感覺對周恩來在一些問題上做客觀準確的評價很難，對他在“文革”中的一些言行因無法判斷是真心還是假意而爭議很大；二是感覺周恩來研究在許多問題上現在還停留在表面化、概念化階段，很難深入展開。形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有四：

(一) 周恩來的思想和實踐活動有時并不代表他的本意，他的工作業績和影響有時超過了任何人，但相當多的時間他又不是最後決策者。學者們有不少看法不一致的問題，因查不到原始檔案，不了解周恩來的真實意圖而無法定論。反觀對毛澤東、孫中山、鄧小平等人研究的爭議并不如周恩來研究爭議大，其主要原因之一這些人處在一把手的位置，可以明確表達自己的思想主張，可以通過政權的力量將自己的思考付諸實踐。而周恩來的位置和他各人的性格使他無法這樣做，他的思想有時隱藏在公開的政策後面，有時在與毛澤東共籌國家大政方針時融為了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所以，在他的從政生涯中哪些是他自己的主張？哪些是他的違心之舉？有時很難辨別清楚。特別是在“文革”中，周恩來與許多政治人物的複雜關係、周恩來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的所作所為，很難從表面現象去判斷和評價。即便我們判斷周的一些言行是違心，仍需要進一步研究周為什麼要違心？均是出於必要的自我保護嗎？是否有性格上的懦弱或圓滑？如果僅僅用“相忍為國”，“顧全大局”來下結論就將政治人物研究簡單化了。所以說分析和評價周恩來比評價毛澤東要困難許多，對毛的不同評判多半是源於作者的不同立場；而在評周的問題上，即便是持有相同的立場的學者，研究的結論也會有很大差異。

(二) 中國大陸黨政領導人檔案不開放，所有中共中央、國務院包括地方政府自1949年來的檔案皆不開放。這些年來由官方新公布的一手資料也不多。現在學者研究只能根據十多年前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周恩來年譜》和《周恩來傳》和更早以前出版的《周恩來早期文集》、《周恩來外交文選》、《周恩來軍事文選》、《周恩來經濟文選》、《周恩來政論選》、《周恩來文化文選》等被官方編輯篩選過的文獻，而1949年後周恩來大量的談話記實、文件批示、會議報告等原始檔案真正的研究人員是看不到的。前幾年中國外交部檔案館的有限開放，彌補了一些資料方面的不足，但前去查檔案的手續又相當繁雜且費用不低。稍令人欣慰的是2008年年初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1—3卷)，可惜只編輯了1949—1951年的內容，1952年後大量的內容還遲遲不肯披露。而與此相關，《毛澤東建國以來文稿》十多卷(1949—1976年)早在十多年前就出版了，《建國以來劉少奇建國以來文稿》四卷本也在幾年前就公開出版了，可見中國官方對周恩來資料的嚴格掌控和有限度開放慎之又慎。

(三) 中國大陸研究的禁區太多，除資料封鎖外，更重用的是思想上的限制。所有中國當代政要，皆需按中共中央的精神統一定調，不許任何人按自己的看法定調，更容不得一點負面評價。這樣一來，學術研究就無法深入展開了。比如對毛澤東的評價，中共中央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定了一個調：即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缺點和錯誤是第二位的，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所做出的重用貢獻遠遠大於由於認識失誤所帶來的損失。⁴⁰⁾現在中國大陸的學者都被要求按這一觀點發表論著，任何比這個官方觀點激進或保守的觀點皆不許問世。而周恩來研究比毛澤東研究更難在中國官方對毛澤東好在還可以允許你一分為二的分析，雖然是說第一位第二位的結論許多人不同意，但對於周恩來的評價，如同對鄧小平一樣，中共官方控制是相當嚴的，只允許你說周恩來優點，不能說一點缺點，任何見諸報刊的評價只能宣傳他們的偉大功績，不允許提及他們的缺點和失誤。這種嚴格的意識形態的控制是學術研究的最大障礙。因為學術研究不等同於政治宣傳，在政治活動中你可以按照政黨的意志、政府的政策去做宣傳和鼓動，但在學術研究上若

40) 對毛澤東的中共官方評價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要求學者們必須恪守統一基調,不許越雷池半步,那就沒發開展研究工作了,只能做宣傳教育工作了。

(四) 中國國內和海外相當一批學者在周恩來研究上的都帶有濃厚的感情色彩,缺少客觀冷靜地、實事求是地分析,尤其是把周恩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和中國的特殊社會環境中分析。學術研究中意識形態的色彩越重,就越難做出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結論。如果帶着對一個人或一個黨強烈的憎惡或熱愛做歷史評判,那這個人、這個黨所做的一切事情在熱愛他的人眼里都是對的,在憎恨他的人眼里都是不對的,那也就不屬於學術研究了。這種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結論是沒有什麼學術價值的。現在中國大陸和海外有大量歌頌性的、攻擊性的關於中國政治人物的書文問世,皆算不上真正的學術研究。表面看來,這些文字使周恩來研究領域似乎成果多多,實際上魚龍混雜,擾亂了人們的視野,干擾了真正的研究。這也是周恩來研究難以深入下去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之,周恩來的研究近年來在中國國內和海外都取得了許多新進展。但同時亦存在着許多不足和難題。周恩來的奮鬥歷程、思想內涵和道德風範,某種意義上代表着中國人民自強不息、無私奉獻的偉大精神。筆者認為,以周恩來為對象的學術研究,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和豐富的思想內涵,深入研究包括周恩來及其他有影響的中國政要思想和事業,做出公正客觀的歷史評價,並對其中有價值的精神遺產賦予新的時代含義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而今後若想將周恩來的研究引向深入,首先需要解決兩個問題是:

第一,應該積極貫徹落實“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打破各種思想學術上的禁區和行政管理上的人為障礙,允許有各種思考,允許查閱檔案和各種資料,允許學者們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觀點。中國大陸在思想開放方面應該步子再快一些,胆子再大一點,只要不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機密,數十年前已經離開人世的政治人物的檔案皆應向民眾開放、至少可以選擇一部分開放。應該向外交部檔案館學習,更應該向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檔案管理體制學習。這樣才會便利和推動學術研究的開展。

第二,研究者要以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嚴謹的治學態度進行研究,切忌主

觀臆斷,更不要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對非本黨派的政治人物的所有思想行為一概否定,對符合自己利益標準的人或事不論對錯一概肯定。這樣是沒法開展學術研究的。當然,基本的政治立場還是要有的。這就是研究者要站在國家和人民的立場上、從是否有利於國家、民族的團結進步,有利於世界和平發展的角度上去評判是非,其所思所想是爲了廣大民眾謀福利的、其所作所爲是對國計民生和世界和平有利的我們就應當肯定,反之,就應該否定。當然,還要把歷史人物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去研究,我們不應苛求於前人。

脫離本國國情,按照現在的標準,按照西方的價值觀念去評價一個數十年前的中國政治人物,難免有偏頗和不適用之處。真正的學術研究應該是史料準確、立論公允,論證有據,評價客觀。

如何給周恩來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如何進一步推動全球周恩來研究不斷向縱深發展?從學術機構建設上看,南開大學作爲中國周恩來研究的重鎮,當繼續加強新生力量的培養,不斷擴大研究隊伍和研究範圍。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應該有責任有信心會同校內外、海內外同仁,長期、持續地開展周恩來與中國其他政治人物的學術研究,抓住機遇,奮發圖強,爭取再上新台階。中國大陸的其他一些大學和黨政機構的周恩來研究愛好者應加強研究隊伍的整合、協調、發展,海外的學者在各自爲戰中亦應加強學術交流。

從學術研究領域看,未來的努力方向應主要圍繞周恩來與中國的政治、經濟、國防、外交、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項建設事業展開,特別是圍繞着周恩來與政黨政治和政府管理這個主題展開。應以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爲主線,深入到相關的各個等重要領域,開展重大課題的研究,不斷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筆者初步思考,今後研究的新視野擬首先在以下課:周恩來與中共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周恩來與中國各民主黨派的關係及政治協商制度、周恩來與新中國的農工商業現代化建設、周恩來與新中國的國防、周恩來與中國的政府管理及其行政管理思想、周恩來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周恩來與中國科技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周恩來與中國對外關係的演變,周恩來與政黨外交等等。

總之,欲了解現代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必需研究周恩來的事業與思想。

換言之,周恩來研究的深入展開,必將有利於我們對中共黨史和現代中國的深入了解。故爾,今後中國和世界各國對周恩來研究有興趣的學者應該携起手來,多做各種形式的學術交流,繼續全力推進周恩來研究向縱深發展。歷史巨輪已經跨入二十一世紀,我們需要用全新的視野,以客觀的標準、重新評價上個世紀對中國對世界有重大影響的政治人物,在挖掘新史料,使用新方法的同時,把歷史人物放在其所處的特定歷史背景下去做深入的客觀的研究。

< 參考文獻 >

- 李天民著,《周恩來評傳》,阿爾泰出版社,1976年3月。
 《周恩來選集》上下卷,由人民出版社,1980。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
 迪克·威爾遜著,《周恩來傳》,解放軍出版社,1989。
 張大衛著,《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來與鄧小平》,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
 [日]鳥居民,《周恩來與毛澤東—周恩來試論》,東京草思社,1975。
 尼克松著,《領袖們》,知識出版社,1983。
 基辛格著,《白宮歲月》,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力平著,《開國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
 石仲泉著,《周恩來的卓越奉獻》,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韓素音著,《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加拿大學者羅納德·C·基思著,《周恩來的外交》,東方出版社,1992。
 第二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外學者再論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全國周恩來生平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裴默農著,《周恩來與新中國外交》,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
 熊華源、廖心文著,《周恩來的總理生涯》,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
 劉武生著,《周恩來的晚年歲月》,人民出版社,2006。
 徐 行著,《周恩來與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奠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 徐 行主編,《南開學者縱論周恩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1-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徐 行著,《周恩來與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奠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
 華夏經緯網02/18/2003 09:09:32:《周恩來40年前的絕密之行》。
 高文謙,《把歷史的知情權還給民衆》,原載《當代中國研究》,2004年第4期(總第87期)。
 金沖及,《談毛澤東與周恩來》,海外名人書庫,http://book.backchina.com。

< 국문요약 >

周恩來의 연구는 최근 중국뿐만 아니라 해외에서도 상당히 심도 깊게 연구 되고 있다 그러나 대다수의 연구자들의 연구에 있어 난황을 겪고 있는 것도 사실이다. 그 몇 가지 어려운 점으로 꼽을 수 있는 것은周恩來의 투쟁 내력, 사상과 도덕성, 그가 갖는 중국민족의 대표적인 자강의식 그리고周恩來 개인의 정신력에 관한 탐구이다. 이와 같은 문제에 대한 연구가 어려운 것은 이들은 당시 시대 상황 및 정치 상황과 불가하여 고찰할 수 없는 것이기 때문이다.

필자는 이와 같은 상황에 입각하여 당시 시대와 정치현실에 대한 진일보한 이해를 바탕으로周恩來에 대한 연구를 진행하고자 한다. 이를 위해선 몇 가지 문제를 해결해야 하는데 본 연구에서 중점을 두고 해결하고자 하는 문제는 다음과 같다.周恩來 개인에 대한 선입견의 배제와 연구자의 객관성 유지 및 실사구시의 정신이다. 본 연구에서는 이와 같은 것을 기본적 마인드로 하여 연구를 진행 하였으며 이를 통해 주은래는 중국인의 시각으로는, 군벌과 열강의 압제와 약탈로 중국인의 생존이 위태롭고 일제의 침략과 국공내전으로 중국 산하가 파멸 위기에 직면했을 때 중국인에게 위대한 희망을 품게 하고 그것을 실현시킨 '인민의 벗'으로 평가 내릴 수 있을 것이다.

중심어:周恩來, 정치, 문화혁명, 毛澤東, 사상, 실천,周恩來文選, 외교, 문헌연구.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08. 7. 18	2008. 8. 7	2008. 8. 21	2008. 9. 20	2008. 9. 30